

数字赋能推动学生资助精准供给的对策

□浙江传媒学院 郑汉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全面脱贫目标实现之后,扶贫工作的重心已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体动态性更强,管理难度更大,对统计监测、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带来更大挑战。

一、新时期做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学生资助推动教育公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集“奖、助、贷、减、补、免”于一体的多元化学生资助体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资助工作对于保障家庭经济相对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接受教育实现升迁性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本质要求。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坚持解决思想政治和实际问题相结合,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本质要求。

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当代青年逐步走向舞台中央,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高等学校更要立足实际,不断完善资助政策,健全资助体系,营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二、“三大困境”: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问题表征

资源配置困境:资助经费与资源的统筹难题。当前我国学生资助体系呈现“混合多元式”特点,资助主体和资助项目呈多样化趋势。然而这些资助项目往往由高校不同职能部门牵头实施,项目申请、审核与监管相互独立,资助信息之间缺乏有效关联,导致学生的资助需求和资助项目之间无法有效匹配;且高校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高水平高校的资助项目多且资助经费充足,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的资助项目偏少且资助经费相对

紧缺。有限资助经费“旱涝不均”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助政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学生认定困境:工作体系与标准的制定难题。高校在工作实践中已基本确定学生填写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进行申请、班级评议小组认定、院系审核确认的模式。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实践操作中的不到位,致使学生困难认定结果与实际存在偏差,如学生提供虚假家庭经济情况数据,班级评议中的主观因素太多导致结果有失公允等。存在问题既有学校无法掌握学生及家庭全国性的信用数据库的客观原因,也有高校学生存在“贫而不申”和“申而不贫”的主观情况。此外,家庭经济条件难以量化、地区经济存在明显差异也会导致学生贫困等级认定的精准度不高。

后期监管困境:重资助轻管理的实践难题。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而言,资助育人是价值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着重资助轻管理的惯性思维,高校往往将确定奖助学金名单、完成资助经费发放作为该项工作的终极环节,对资助学生的跟进式教育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贫困生非理性使用资助金或投机获取资助的现象增多。虽然诸多高校对规范奖助学金申请和使用作出制度要求,但由于人情风险、政策风险等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叠加效应,对贫困生违规使用资助金现象“不敢管、不愿管”等消极处理方式比较普遍。

三、数字赋能:资助工作精准供给的路径选择

精准配置资源,加大高校资助信息统筹力度。利用大数据推进精准资助,必须构建与大数据特征相匹配的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一是在供给侧建设政府、高校、社会资助资源数据库。系统对接和统筹各类资源配置,有效改善资助资源可持续乏力状况,借助大数据管理平台的端口,切实增强对资助项目、资助经费、资助对象、资助方式的宏观把控和精确调配。二是在宏观政策层面制定大数据发展规划,统一数据标准。以全体受助学生数据库为依据,制定相对统一的科学算法,推动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三是主体动力机制的制定与运用。既要强化相关工作主体的职业责任感,提升有效配置资源的责任意识,又

要通过受助主体体现资助育人的成效,在保障性资助基础上,拓展完善发展性资助,并以此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合理依据。

精准识别认定,构建科学帮扶资助体系。一是制定科学的精准识别指标体系。提炼出贫困生识别的主要指标,如生源地信息、家庭经济收支信息、家庭成员信息、个人征信及消费行为大数据等,进行相关因子分类,并运用大数据技术为贫困生“画像”,建立符合本校工作实际的贫困生“模型”,精准筛选、识别贫困生。二是采用形式精准的资助方法。针对“贫而不申”等问题,在兼具公平与隐私之间,高校可通过由各类数据呈现的学生“画像”,灵活采用有偿资助与无偿资助的形式,最大化地利用资助资源,对学生进行最优化的资助。三是完善动态响应工作机制。通过数据信息的动态更新,根据学生的贫困原因、程度、变动态势在资助额度、类型、层级上实时作出调整,使帮扶力度切合每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程度。

精准监督管理,推进资助过程精细化。一是加强集成管理和动态管理,提高管理绩效。通过优化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资助学生评奖评优、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信息的集成管理,对学生个体受助情况及日常消费进行动态监测,灵活调整“有偿资助”与“无偿资助”比例,提升经费利用效率。二是借助隐性资助方式,彰显人文关怀。适当省去申请、审核、公示等烦琐工作程序,运用定向监测和动态分析方法及时准确发现受助学生的困难和需求。三是综合运用评价反馈机制,践行资助育人理念。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学生课堂考勤、图书借阅、学业成绩、专业实践等数据与运动休闲、娱乐消遣等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以学生受助前和受助后两个时间点采集信息,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并结合师生评议反馈等内容,对资助的育人功能进行全面考量,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大数据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应在价值理性的引领下发挥功效。高校学生资助需要数字赋能,但不能陷入“数字陷阱”,正视在当前客观条件下运用数字化改革提升学生资助工作精准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才能积极稳健地推进高校精准资助工作。

□德清县雷甸镇初级中学 沈珺芳

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到,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研究性体验学习,研学旅行有助于学生把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相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融合,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何才能让“研学”和“旅行”比翼齐飞,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困境,正确认识

1. 地方旅游资源和研学课程达不到有机融合
地方旅游资源和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的重要课程资源。以德清县为例,有兼具自然风光和民国韵味的自然人文类旅游资源莫干山,有反映乡村地貌变迁的自然科学类旅游资源下渚湖湿地公园,有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人文历史类旅游资源新市古镇等。但这些资源由多部门管理,比较分散,且多以休闲、娱乐作为开发着力点,未能真正实现资源开发与课程建设的有机融合。

2. 农村学校研学旅行意识淡薄

中高考升学压力是教育主体对研学旅行缺乏关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部分农村中学教师并不了解何为研学旅行,即使部分教师知道研学旅行,迫于升学的压力,也漠然置之。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家长认为研学旅行费钱费时,影响学习。此外,有的学校、教师片面地认为研学旅行无非是“春秋游”“夏令营”,从而导致有些研学旅行活动达不到研学一致的目的。

3. 农村学校开展研学旅行的相关支持较少

相比于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开展研学旅行的活动地域支持较少。即使理论上农村学校可以去城市开展研学旅行活动,但交通等因素增加了活动成本,旅行无法有效开展。

二、提出对策,开发课程

1. 梳理旅游资源,建设研学旅行活动基地

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支持各地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大型公共设施、知名院校、工矿企业、科研机构,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逐步完善接待体系”。因此,各地要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根据不同学段和地区的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开发建设一批适合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基地,把研学旅行功能最大化。

以德清县为例。德清县历史悠久,自然风光秀美,拥有名山、湿地、古镇三大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理信息产业也在德清蓬勃发展,地理信息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如无人驾驶观光车、卫星导航、航空航天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依托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建立一批具有德清特色的研学旅行活动基地。

2. 围绕核心素养,设计研学旅行精品路线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综合表现为九大素养,即“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根据这些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在活动开始前、活动进行中、活动结束后要认真准备和组织,精心设计路线,把活动的视角不只放在“旅行”上,更放在“研学”上。

例如,前往莫干山开展以“认识莫干,青春远足”为主题的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一方面让学生在登山的过程中体验自然生态,了解莫干山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培养学生感知历史、尊重历史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校外远足旅行生活和集体活动的体验,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探究能力、批判性思维等“认知性素养”,以及自我管理、组织能力、人际交往等“非认知性素养”。

3. 坚持“研”“行”一致,开发实施研学旅行课程

研学旅行要极力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的现象。因此,既要研究研学旅行中能实现立德树人价值目标的课程设计实施方案,又要从目标、内容、形式、评价方式上对研学旅行的课程进行专业设计,研究如何将语文、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等学科课程融为一体,通过研学旅行进行课程方案整合,实现综合性学科的学习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乡音乡情”的校本教材。

德清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基于地方文史资料的历史与社会拓展性课程“符号德清 家乡文史”和“衣冠上国——汉服的演变”。其中,“衣冠上国——汉服的演变”分为6个篇章,课程梳理了中国传统服装从汉朝到民国的演变历程,让学生对传统服装的演变有了基本认识,意识到其不仅仅是衣服,更是历史的见证。学生也可以到服饰博物馆、欧诗漫博物馆进行有关服饰的研学旅行,加深学生对服饰的理解,从而更加热爱汉服,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2019年,德清县钟管镇被认定为湖州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在“红、橙、黄、绿”4条特色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基础上,推出红色+文化+生态+活力的特色研学之旅路线,打造了蠡山景区、干山红色小镇、美丽健康田园综合体等6个活动专区,设置了范蠡成功之道、古桥文化、忆苦思甜、纯净之旅等6门课程。

以干山红色小镇为例,我们以“重温红色记忆,珍惜幸福生活”为主题,通过参观干山公社,了解相关革命历史,激发爱国热情;通过参观红色纪念馆,在老物件中感受老一辈的勤俭节约,感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通过参观国防教育馆,感受现代国防科技的力量;通过“八八战略”乡村改革馆,了解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德清人如何凭借着“五勇精神”创新创业,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研学旅行”包含了“研”“学”还有“旅行”,旅行是形式,研学才是本质。“只旅不学”和“只学不旅”都失去了研学的真正含义,我们要让“研学”与“旅行”比翼齐飞。

依托县域旅游资源开展研学旅行的策略及建议

自组织理论视域下

教师校本教研共同体的建设探微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盛翌禾

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曾在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建设好以校为本的教研团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确有必要倡导教学研究价值的理论导向及操作性强的实施措施,以更好地引领学校的教学研究,提升教师团队的教学素养。

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引入自组织理论相关方法,重新规划校本教研共同体内在有效运行机制,探寻其由他组织走向自组织的建构路径,从而推进校本教研共同体内生式发展。

一、自组织理论:校本教研共同体建设理论基础

自组织理论是指在没有外部指令条件下,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能自行按照某种规则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的自组织现象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系统怎样从混沌无序的初态向稳定有序的终态的演化过程和规律。从自组织理论考量教师校本教研共同体,有利于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共同体旨在秉持改善学校办学质量和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愿景,让参与学习活动的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从学校的实情出发,依托校方自身优势资源和特色,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内容,通过参与会话、活动、协作、反思和问题解决等形式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氛围的动态结构。这与自组织系统内各部分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运行过程十分相似。

二、导向迷思:校本教研共同体建设发展误区

若统一、优良的价值导向是校本教研共同体自组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导向迷思所造成的价值异化则是共同体存在的阻滞。校本教研共同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未展现出共同体应有之态,反而更多地依赖于外部行政结构的控制,面临着“教而不研”“研而不教”“教研无实效”的现实窘境。

首先,校本教研共同体中教师研究之态式微。由于现实教学中对学生升学率的考评、教师评价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教师在思想上并不认为教研活动能够对教学提供很好

的帮助,从而缺乏开展校本教研活动的积极性。其次,校本教研活动脱离教学实际。校本教研应该以学校为根本,以课堂教学实际为研究对象。然而教师的校本教研过于形式化,教研内容仅仅局限于学术探讨和理论交流与沟通,不能有效应用到实际教学课堂。最后,教师的校本教研能力较弱。很多教师属于经验型教师,他们对课堂教学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以往的课堂实践,对于教学策略、学生兴趣、个性引导、教育时机等内容没有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过探究,不利于其自身教学能力的有效提高。

因此,需要探寻教师校本教研共同体自组织导向回归策略的有效路径。

三、“五力”齐驱:校本教研共同体建设策略探寻

1. 互通联动“一体化”,升华为内驱力

作为成长的自主体,教师应做好自我监督和成长规划。如在常州星河实验小学,每名教师根据学校的三年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制订自身年度发展规划,从《教师自主创新修炼手册》(1.0版)到《教师学期自主发展规划》(2.0版),再到《教师自我领导力的主动发展规划》(3.0版),自主思考,让目标落地,提升专业水平。

教师可以自由组队合作,建立自学习中心,将各学科各领域研习资料和线上学习途径予以整理,方便自由获取资源。无论是顶层规划还是自主规划,都需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推动团队蓬勃发展。

2. 凝聚多元“协同流”,升级融合力

高品质的教研要在全校联动中构建教研体,在全员参与中丰盈教研面,在深度推进中落实教研点。因此,为教师搭建平台、激发潜能尤为重要。如搭建专业发展平台——聚焦课堂、教科研和教学基本功;项目统筹平台——大型活动的项目负责制让很多教师成为项目负责人;学科活动平台——丰富的学科活动让我们看到很多教师的想法在闪光;综合发展平台——教职工运动会、读书故事分享等。

3. 创建自主“经营体”,撬动发展力

高度自主的教研共同体应该让每一个教师都参与其中,成为教研的策划者、主体参与者。如宁波市鄞州蓝青小学协同教研协助主管,组成智囊团,根据教师的需求开发设计不同的主题培训,结合教师所在团队、课题研究共同体、备课组

团队、班级联合团队,来设置需求的课程。

其中,将需求的课程打包至不同的团队进行自主培训,这些团队就成了校本培训的自主经营体。经营体首先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和流程办事,构建一个相对稳定、规范的管理体系,让运作更加协调高效;其次计划的实施必须行于精细,出具活动方案,有条不紊,材料规整;最后立于团队,建立交互式教研互助与监督机制,以确定行动的支点,制定行动的策略。

4. 搭建深度“云平台”,加速成长力

疫情期间,教师们外出学习的脚步受阻,但坚持“停课不停研”,构建了教研新模式。比如,教育科研部以“有光书院”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小学重新设置校本培训课程,在教育智能部的技术研究与协助下教师们开展线上学习和研讨活动,打破了地域界限,拓宽了学习机会。

“云学习”跨越了资源壁垒,在“互联网+教育”的校本研修活动中促成知识共建共享,并协同课程研发部推进校本课程,推进教师在课堂与课外的实践。随着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学习资源的分布形态将进一步改变,重构教师教研活动的空间结构。

5. 推行评价“贡献度”,激活研究力

在现代管理心理学中,教师无法以时间来评价教师工作的质量和品质,故为学生和学校的发展创造价值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教师精神上的需求。教师职业延展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成就学生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可持续的、有价值的、深层次的精神塑造。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打破了以年龄、教龄、资历作为评价标准的传统模式,采用“1+N”的贡献度评价方式。“1”代表教学方面最基本、最本职的工作量,“N”包含德育、多人团队、校本课程建设、教师校内担任职务和特殊贡献等多个方面。如果不存在“1”,也不存在其他的“N”,但是一旦达到“1”,更看重“N”的发展。

在未来,教师的角色将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个性化色彩。教师不仅是知识传递和精神塑造的导师,更是实现自身幸福成长和人生价值的创新者。校本教研共同体自理论建设和实施有助于激活教师研究热情,实现教师教育意义,为学生未来发展创造价值,为教育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